

在政治經濟学的教学中必須貫徹党的 八届八中全会的精神

曾啓賢 張福秋 吳佩鈞 刘光杰

在偉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前夕，党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經驗，特別是总结了执行党的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总路綫的經驗；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当前的政治形势和經濟形势，并且提出了反右傾、鼓干劲、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在1959年內提前完成第二个五年計劃（1958年到1962年）主要指标，在十年左右的時間內（从1958年算起）实现“在十五年內，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英国”的口号，大大提前超额完成十二年（1956年到1967年）农业发展綱要的战斗任务。全会号召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在以毛澤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同心同德，团結一致，反右傾、鼓干劲、为实现这个偉大的战斗任务而奋勇前进。八届八中全会的偉大号召，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迅速地化为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巨大力量。事实已經証明了，事实还将不断地証明，八届八中全会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設时期的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會議。

全会的文獻，深刻地闡明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精神和內容。党的社会主义建設的总路綫，是毛澤东同志關於社会主义經濟学說的集中表現，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偉大发展，它不仅为馬克思主义的理論宝庫中添加了新的內容，而且为馬克思主义的理論研究工作，特別是馬克思主义政治經濟学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認真学习，力求精通，并在实践中运用八届八中全会所給予我們的銳利的理論武器，更高地举起毛澤东思想的胜利旗帜，与右傾机会主义进行彻底的不調和的斗争，把政治經濟学的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这是摆在我们經濟理論工作者面前的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务。

在这篇文章里，我們仅仅是企图就几个問題談談学习中的一些粗淺体会，希望得到同志們的指正。

一、關於过渡时期階級斗争的問題

过渡时期的階級斗争問題，是馬克思主义政治經濟学中一个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問題，也是右傾机会主义妄图篡改的一个根本理論問題。

右傾机会主义者代表我国当前的反社会主义势力，发动了一场反对无产階級及其政党的階級斗争，向党和党的总路綫进行了恶毒的攻击。但是，为了掩护他們的阴谋活动，他們虛伪地散布所謂在我国“階級斗争已經結束了”的謊言，大事宣揚什么“不應該再搞社会革命，應該全力轉向自然革命”的謬論。右傾机会主义者是人民的反面教員。通过这些反面教員的言行，使我們懂得了許多新的东西，首先是使我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党中央和毛澤东同

志關於我國過渡時期階級鬥爭形勢的分析，關於過渡時期階級鬥爭是長期的波浪式發展的規律的概括，是無比英明和極其正確的，是對於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意義重大的創造性的發展。

大家知道，馬克思曾經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與這個時期相適應的是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无產階級的革命專政。”（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列寧發展了馬克思的論斷，他指出：“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中間隔着一個過渡時期，這在理論上是毫無疑義的”。他還進一步指出：“這個過渡時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資本主義與生長着的共產主義彼此鬥爭的時期”。（列寧：“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經濟和政治”。）

既然過渡時期是一個消滅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那麼過渡時期的主要矛盾必然就是社會主義經濟同資本主義經濟的矛盾，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這個矛盾的主要表現就是在一切領域中的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鬥爭。社會主義的發展和勝利，也就是資本主義的削弱或死亡，因此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矛盾和鬥爭按其性質來說是对抗性的矛盾，是一個“誰戰勝誰”的你死我活的鬥爭。這一矛盾和鬥爭，貫串在整個過渡時期中，貫串在過渡時期社會政治生活和經濟生活的一切方面和一切領域，只要社會主義尚未完全建成，階級尚未完全消滅，它就始終是過渡時期社會發展的動力。

因此，整個過渡時期存在着階級鬥爭，這是一個客觀的必然性，它是由過渡時期的經濟結構和階級結構，以及無產階級在過渡時期所要完成的任務所決定的，而不是右傾機會主義者的几句謊言和某些人的主觀愛惡所能否定的。

有些人曾經錯誤地認為，經濟戰綫上的社會主義革命一經取得決定性勝利，生產資料所有制的變革已經完成，就意味着資產階級已經消滅，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矛盾已經解決，也就意味著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宣布結束。抱有這種觀點的人，不但對於過渡時期階級鬥爭的認識是錯誤的，而且同時對於整個過渡時期也每每存在着誤解，即把生產資料所有制的變革，作為過渡時期的唯一任務，從而把所有制的改造是否完成，作為過渡時期是否終結的唯一標志。

黨和毛澤東同志駁斥了這種錯誤論點。毛澤東同志指出，在我國，雖然社會主義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說來，已經基本完成，但是，階級鬥爭並沒有結束。他着重指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這就明確告訴我們：不能把生產資料所有制的變革作為過渡時期的唯一任務；在整個過渡時期，不但要完成經濟戰綫上的社會主義革命，而且必須完成政治戰綫上和思想戰綫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我國的革命實踐，充分証明了毛澤東同志的論斷的英明和正確；其他許多社會主義國家的革命實踐，同樣地充分証明了毛澤東同志的論斷的英明和正確。右傾機會主義者的反黨活動本身，也正是同樣地証明了毛澤東同志的論斷的英明和正確。

右傾機會主義者為了掩飾自己的罪惡活動，轉移人們的視線，還有意歪曲技術革命與文化革命任務的提出，說什麼“經濟戰綫、政治戰綫、思想戰綫都已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技術革命與文化革命的任務提出來，就意味着全力轉向改造自然了，不應該再搞社會革命了”。這

同样地完全是谎言和恶意的歪曲。

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下，我国经济战线、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确已经先后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是，这一系列胜利的取得，只是意味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这三条战线上的矛盾与斗争，获得了基本的解决，而并不意味着阶级斗争的一切问题都已经全面、彻底、最终地解决了。因此，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本点中，在提出“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同时，就极其明确地提出：“必须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右倾机会主义者把文化革命、技术革命和三条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截然对立起来，认为二者是互相排斥的，不可以同时进行。他们极力宣扬这种谬论，其目的不仅是妄图篡改党的总路线，而且也是在于蓄意麻痹人们的革命警惕性，把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中的阶级斗争掩盖起来。实际上，在过渡时期，在阶级仍然存在的时期，根本就不存在与社会革命无关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虽然与社会革命有区别，但它们又是紧密地联系着的。首先，在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任务的过程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于技术和文化的不同看法，必然会展开尖锐的斗争。同时，我国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是在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在这两个革命的进行中，就不可能设想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思想工作，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正确处理。而且，大家都知道，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也没有把改造自然与改造社会看成是截然分离、互相排斥的两件事情。人们的社会斗争和与自然的斗争总是互相影响，互相推进的。由此可见，谎言终究是谎言。右倾机会主义者虽然肆意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到头来总归是不敢同真理对证的，总归是要被事实彻底粉碎的。

但是，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这一次向党猖狂进攻，倒的确从反面为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通过与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首先，我们应当更明确地认识到，我国现在还处在由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阶级依然存在。对于旧的社会经济制度虽已基本改造完成，但是尚未彻底完成，例如资本家还拿定息，乡村还有少量私人所有的小型生产资料，还有私人活动的初级市场（当然，在国家和公社的正确管理下，这些成分不会向资本主义发展，而是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习惯势力，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彻底克服。地、富、反、坏、右等类分子的改造，还要经过一段时间。城乡资产阶级反动的思想活动和政治活动，在1957年整风、反右派斗争中虽然受到了一次决定性的打击，但是还远远没有被彻底清除。他们的反动的思想和政治活动，在一部分富裕中农和知识分子中尚有市场，一遇风吹草动，他们就要蠢动起来。因此，必须认真领会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文件的精神，认清当前的形势，特别是要认清我国当前还存在阶级斗争这一个客观事实，提高我们的革命警惕性。

通过与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我们还应当更进一步从实践中领会和掌握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所概括的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必须认识到，在整个过渡时期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曲折的，复杂的。它不断起伏，时而紧张，时而缓和。当一次斗争中无产阶级取得了胜利，敌人的进攻被压服，斗争就可以暂时缓和下来。但是，剥削阶级是决不会一下子甘心自己的死亡，决不会自动地放弃阵地退出历史舞台。因此，在一定的条件下，剥削阶级的复辟的企图就会变成行动，斗争就又会尖锐起来。时紧时松，时强时弱，呈现波浪起伏的状态，一直到最后才熄灭。这就是过渡时期阶级斗争

的規律性。正如刘少奇同志說的：“无产階級和資产階級之間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在整个过渡时期都是不可避免的。不过这种斗争象波浪的起伏一样，有时候高，有时候低，有时候表現尖銳，有时候比較緩和。这种斗争，要到資产階級的政治的和思想的影响最后消灭的时候，才会熄灭”。（“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

毫无疑义，这一次右傾机会主义者向党猖狂进攻，就极其清楚地体现出这个規律性。

最近期間，國內外的敌对势力利用我們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某些暂时性的、局部性的、早已克服或正在迅速克服中的缺点，加紧对我們党的总路綫、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恶毒攻击。右傾机会主义分子，配合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活动，打着所謂“反对小資产階級狂热性”的旗号，发动了对总路綫、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他們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說成是“两大罪状”說成是“左傾冒險主义”的行动，是“得不偿失”或者“有失无得”，借以达到否定成績，否定总路綫的目的。右傾机会主义分子的攻击的矛头，是針对着我們的党和党的总路綫，針对着无产階級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因此，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指出，右傾机会主义已經成为当前的主要危險。團結全党和全国人民，保卫总路綫，击退右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經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

政治經濟学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宣傳和保卫党的总路綫，是政治經濟学教学的首要任务。因此，政治經濟学的教学工作必須站在反对右傾机会主义的最前列，在我們的教学中毫不含糊地对待过渡时期的階級斗争問題，彻底揭露和批判右傾机会主义者散布的“階級斗争熄灭論”和其他一切謬論，把反右傾机会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二、關於國民經濟高速度和按比例发展問題

党的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是党和毛澤东同志把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結合起来制訂的一条正确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綫，是一条能够最有效的和最充分的發揮我国六亿五千万人民羣众的积极性，来加速社会主义建設的路綫。右傾机会主义者站在反社会主义的立場，企图把历史的车輪拉回到資本主义的道路上，因此，他們的攻击就自然集中到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上面来。他們特別仇視大跃进，仇視高速度，正是表現他們与中国人民的胜利前进，完全是背道而馳。

刘少奇同志在总结我国十年来所取得的偉大成就时指出：“中国人民十年来的胜利，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的总路綫，社会主义革命的总路綫，社会主义建設的总路綫的胜利”。（“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

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本質，是对人民羣众在建設社会主义事业中的覺悟性、积极性、創造性的高度的重視，就是要調度六亿五千万人民的积极性和創造性，高速度的发展社会生产力。刘少奇同志在它的“八大”二次會議上的報告中說：“建設的速度問題，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摆在我們面前最重要的問題。我們的革命就是为了最迅速的发展社会生产力。”高速度这已經是为社会主义各国建設实践所充分証明了的一条普遍規律，社会主义經濟的高速度发展，是指整个國民經濟全面的、持續的跃进，而不是指國民經濟某一个別部門，或者暫时的現象。社会主义經濟的高速度发展，具有重大的政治和經濟意义，它表明社会主义制度比資本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它表明社会主义在同資本主义的和平經濟

竞赛中，有充分可能在历史上一个最短的时期内赢得这场竞赛。高速度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根本问题。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中，必须阐述清楚高速度发展的客观必要性和可能性，阐明高速度的规律性，巩固的树立高速度的思想；必须阐述清楚高速度发展与按比例发展的关系，巩固的树立在高速中求平衡的思想；必须阐述清楚高速度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高度结合，巩固的树立既见物又见人的思想。

右倾机会主义者攻击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高速度，主要论根是：高速度“违反客观经济规律”，“引起比例关系严重失调”。这些论据都不过是彻头彻尾无中生有的捏造。

说高速度“违反客观经济规律”，恰好证明右倾机会主义者根本不懂得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因为高速发展本身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所固有的，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客观必然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公有制的建立，生产的目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要求高速度发展社会生产力，以便最充分的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经常增长的需要。同时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和平竞赛中，也必须赢得时间。因此，高速度发展就有了必要。社会主义消灭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也就消灭了资本主义所不可克服的失业、危机和各种对抗性的矛盾。在公有制基础上所实行的计划经济，保证国家能够根据所面临的政治经济任务，按照统一的意志和计划，最大限度的节约和合理的使用人力，物力和财力，这样也就有可能使整个国民经济高速度的发展。由此可见，高速度发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客观经济规律。因此，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什么高速度“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问题。情况正好相反，正是右倾机会主义者自己违反了高速度发展的客观经济规律。

说高速度引起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同样地证明右倾机会主义者根本不懂得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社会主义经济既是高速度发展的；又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的高速度发展与按比例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统一的规律性的两个方面，他们是不可分割地结合着的。高速度发展必须以按比例发展为前提，同时高速度发展又不断地改变着旧的比例关系，建立新的，适应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比例关系。二者密切结合，互相促进，互相推动而又互相制约。因此，把高速度与按比例割裂开来，并且对立起来，似乎高速度就必然排斥按比例，按比例也排斥高速度，也是根本错误的观点，是根本违反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规律的观点。

我们在考察社会主义经济是否按比例发展时，必须从战略性比例着眼。社会主义经济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存在着许多错综复杂的比例关系，其中必然有一些是带有影响全局性的根本性质的比例关系，对这样一些比例关系作出正确的，恰当的安排，就能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的全面跃进。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再生产的原理，这样一些比例是：生产资料生产与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具体表现为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与此相联系的有积累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

事实是：我国经过1958年大跃进，在这样一些主要的，具有战略性的比例关系方面；不仅没有发生什么右倾机会主义者捏造出的失调现象，正好相反，它们比过去是更为适应了。而且，正是这种更为适应的情况，就使得我们能够在1959年取得继续跃进。经过1959年的继续大跃进，我国在1958年开始出现的国民经济发展的又高速度，又按比例地跃进局面，已经完全确定下来了。

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抓住我們在大躍進中所曾經出現過的，並且早已克服或正在迅速克服的、個別的、局部的、暫時的、比例不協調現象，誇大為整個國民經濟的比例失調，企圖以此來攻擊總路綫和大躍進，這除了暴露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本質以外，也反映了他們對於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無知。在國民經濟發展過程中，尤其是在國民經濟高速度發展中，個別的、局部的、暫時的、比例不協調現象是會經常出現的，平衡是相對的，不平衡則是絕對的，但是這種個別的、局部的、暫時的、比例不協調現象也是容易克服的，當然，我們必須做好國民經濟的計劃工作，儘可能使國民經濟的各個部門互相協調地向前發展。“我們的要求是：又要高速度，又要綜合平衡，這樣做是不容易的……只要我們注意總結經驗，認真研究客觀經濟規律，在高速度中求平衡是能夠做到，也是應當做到的”（劉少奇：“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勝利”）1958年和1959年的連續大躍進，無可辯駁地說明了：在高速度中求平衡，我們是已經做到了，今後繼續做到，也是確定無疑的了。

還應該指出：在速度同比例的關係上，比例必須服從於速度，比例的選擇，安排必須服從於高速度發展社會生產力的要求，也就是說，比例的選擇必須以總路綫為依據。離開了總路綫，離開了高速度發展社會生產力的要求，比例的安排就會失去任何積極的意義和作用。只有服從於高速度的比例，才是積極的、才有利於去組織國民經濟持續躍進。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我們的分歧之一也就在於：他們是要求速度服從比例，把比例看成是絕對的，靜止不變的，不能打破的東西，不然就是“不按比例”，就是“國民經濟比例失調”。讓速度去服從比例，去遷就比例，實質上就是不要高速度，也就是不要總路綫。右傾機會主義者的用心，是非常陰險惡毒的。

總路綫不僅給我們指出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方向，規定了高速度發展生產力的任務，而且還依據社會主義經濟高速度和按比例發展的客觀規律的要求；提出了一整套“同時並舉”的方針，即：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條件下，工業和農業同時並舉，重工業和輕工業同時並舉；在集中領導，全面規劃，分工協作的條件下，中央工業和地方工業同時並舉，大型企業和中小企業同時並舉，洋法生產和土法生產同時並舉。這一整套“同時並舉”方針，是毛澤東同志的偉大創造，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豐富和發展，是黨的羣眾路綫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具體應用，它給我們指出了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

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條件下，工業和農業同時並舉，這是我們黨的一貫的方針。毛澤東同志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個著名的講演中指出：“我國的經濟建設是以重工業為中心，這一點必須肯定。但是，同時必須充分注意發展農業和輕工業。我國是一個大農業國，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發展工業必須和發展農業同時並舉，工業才有原料和市場，才有可能為建立強大的重工業累積較多的資金”。

黨所提出的工農業並舉的方針，是基於農業在我們國家具有極端重要的地位，“在我們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地大物博的國家里，農業是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早在抗日戰爭將要勝利的時候，毛主席在“論聯合政府”一書中就指出：“農民——這是中國工業市場的主體。只有他們能夠供給最豐富的糧食和原料，並吸收大量的工業”。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講演中，毛主席進一步論證了農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他說：“大家知道，輕工業和農業有極密切的聯繫。沒有農業，就沒有輕工業。重工業要以農業為重要市場這一點，目前還沒有使人們看得很清楚。但是隨着農業的技術改革逐步發展，

农业的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设、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将日益增多，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情况，将会易于为人们所理解。……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大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的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点，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我国十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也完全证明了毛主席这个英明的论断。没有社会主义的大工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大农业；没有社会主义的大农业，也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大工业。

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方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内容。在农业合作化还没有完成，工业基础还非常薄弱的时候，工农业并举方针的主要内容是，使农业合作化的速度同社会主义工业的速度相适应，经过合作化来促进工业化。毛主席在1955年“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这样写道：“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在毛主席这个思想指导之下，在工农业并举方针指导之下，党采取了一系列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终于在1955年秋冬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基本上完成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并且在农业合作社得到巩固和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的基础上，1958年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全国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化，这就进一步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使农业生产也同工业生产一样，实现了大跃进。

但是，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大跃进，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要求农业生产成倍以至几倍的增长，而农业生产却仍然建立在落后的手工技术基础上，农业生产这种落后的技术状态，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是不利的，社会主义既不可能长久地建立在两种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即农业是个体所有制，工业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础上，也不可能长久的建立在两种相差悬殊的技术，即农业是落后的手工技术，工业是先进的现代技术的基础上，为了使农业的发展同工业的发展更相适应，就必须改变农业的技术落后状态，迅速地实现农业的技术改造。因此，在加速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同时，积极的和逐步的实现农业的技术改造，尽快的使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利化，和电气化，这是工农业并举方针在新形势下的新内容，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一项头等重要的任务。

党所提出的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洋法生产同土法生产同时并举的方针，同样地是促进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持续的、全面的跃进的保证。

右倾机会主义者反对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反对党所提出的一整套同时并举的方针，这特别表现在他们反对群众性的大办钢铁运动，因为群众性的大办钢铁运动，是全党和全国人民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一整套同时并举方针的一次伟大的实践，是我国劳动人民为了尽速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而进行的一次伟大的斗争。

右倾机会主义者说：“大办钢铁，得不偿失。”其实，他们根本不懂得怎样算账，算什么账。他们只是看到，在一个时期之内，我们生产的钢铁成本高一些，质量暂时差一些；但是，他们却没有看到，由于群众性的大办钢铁运动，就使得我国钢铁工业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使得我们在一个很短的期间内，获得了几千万吨的钢铁生产能力，有了钢铁工业的高速度发展，我们也就有了整个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去年的大办钢铁运动，就为我国国

民經濟的高速度發展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礎，這難道是“得不偿失”嗎？他們還說：“大辦鋼鐵，擠掉了一切”。這是閉眼說瞎話！實際情況是：1958年，由於大辦鋼鐵，以鋼為綱，出現了工業大躍進，結果是煤炭工業、電力工業、機械工業、紡織工業，各行各業都在鋼鐵加番的帶動下，實現了全面的躍進。難道大辦鋼鐵不正是帶動了一切而倒是擠掉了一切嗎？右傾機會主義者的任何論據都是經不得一駁的。

三、關於人民公社的產生和發展問題

人民公社是我國經濟和政治發展的必然產物，是我國勤勞勇敢的六億五千萬人民的偉大決心和偉大智慧的表現，是我們黨和我國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同志創造性地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實際結合起來的產物。在黨的領導下，只經過了幾個月的時間，就在全國範圍內實現了人民公社化（除個別少數民族地區以外）。經過整社後，人民公社迅速地走上了健全的鞏固的道路，出現在亞洲東部地平線上的這個初升的太陽越來越強烈地發出它的巨大的熱力和燦爛的光輝。八中全會用不可辯駁的事實，說明了我國農村人民公社不但站穩了腳跟，而且日益顯著地發揮它的優越性，徹底粉碎了國內外反動派的誹謗，尖銳地批判了污蔑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右傾機會主義觀點。

大家知道，右傾機會主義者曾經製造出許多奇談怪論來非難和攻擊人民公社，說什麼公社是“怪胎”，是“早產兒”，“超過了社會發展的水平 and 人民羣眾的覺悟水平”，一句話，在他們看來，人民公社“辦早了、辦糟了”。

人民公社是“怪胎”或“早產兒”嗎？它“超越了生產力的水平”，違背了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規律嗎？不。這是右傾機會主義者對於人民公社這個新生的幼芽可恥的嘲笑和污蔑。事實與右傾機會主義者所說的截然相反，人民公社的出現，完全符合生產關係適合於生產力性質的規律的要求，完全適合於我國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要求。大家知道，人民公社是在我國工農業生產大躍進的過程中出現的。正是由於工農業生產的躍進發展，要求大規模地興修水利，要求全民辦工業，要求結合發展農業的多种經濟，要求在各種較大規模的生產事業上實行勞動協作，並且要求逐步實現農業的技術改造，於是，原來的小規模的單純經營農業的高級社的組織形式就顯得不適合客觀發展的需要了，生產關係需要進一步改善和調整了，這樣，在原來合作社的基礎上，人民公社就“順乎天理”地產生出來。

那麼，右傾機會主義者憑什麼來叫嚷人民公社“超越了生產力的水平”呢？他們的可怜的“理論”武器，不過是老牌修正主義者的早已臭名遠揚的“生產力論”。這個荒謬“理論”的所謂“生產力”，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生產力根本不同。我們看待生產力，是既見物，又見人，不但要看到生產力中的技術、工具、而且首先要看到生產力中人的作用，特別是要充分估計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得到了解放的勞動者的作用。應當看到，即使只是這些勞動者大規模地聯合起來，也會形成新的生產力，形成客觀新的要求。

但是，右傾機會主義者與我們完全相反，他們只見物，不見人，離開一定的社會關係，把生產力歸結為單純的技術、工具。認為人民公社應該先有機械化、電氣化作為基礎，否則就不應該組織以“公”和“大”為特點的人民公社。即使組織起來了，也應該解散，這真是荒謬絕頂。當然，我們十分需要機械化、電氣化，但是在原有的小規模的高級社的範圍內，

能不能徹底實現农业技术改造呢？显然是不可能的。而人民公社却为使用現代技术提供了更好的条件。那么，为什么不应当組織人民公社呢？实际上，右傾机会主义者根本不懂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間的辯証关系，但他們偏偏要不懂装懂，胡说什么人民公社的誕生違背了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性質的規律。結果，就只能落得一个在事实面前碰得焦头烂額的下場。

人民公社超过了人民羣众的觉悟水平，不是广大农民的要求，只是少数人主观愿望的产物嗎？不，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合乎中国农民要求迅速改变农村面貌、摆脫“一穷二白”状况的一个偉大的羣众运动。右傾机会主义者污蔑人民公社化运动不是出于羣众自觉，是共产党强加于羣众头上的东西，这也是毫无根据的謬論。因为第一，衡量党的路綫、方針、政策是否正确，唯一的尺度是要看它是否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羣众的最高利益，是否集中了最大多数人民羣众的意志和愿望。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不是符合最大多数人民羣众的最高利益，反映了他們的意志和愿望呢？正是这样。实践已回答了这个问题。早在1958年春夏之間，河南省和其他一些省分的好些地方，就实际上出現了人民公社这种組織形式，根据羣众的創造，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了“人民公社好”的号召，正因为这个号召表达了广大农民的意志，所以它受到广大羣众的拥护和支持，一触即发，短短的几个月內，就在全国範圍內实现了人民公社化。沒有羣众的自觉就沒有革命羣众运动。如果人民公社不是羣众的要求，党决不可能将它强加在五亿农民的身上，迅速实现人民公社化，即使建立了人民公社也不能巩固。第二，人民公社的运动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繼續和发展，因此，在公社化运动的过程中，富裕中农阶层必然会有抵触，地、富、反、坏、右必然会从根本上反对，这些人发出反对公社或不滿的叫囂是毫不足怪的。决不能把这一小部分人的叫声当作广大羣众的要求。广大的貧农和下中农对于人民公社是拥护的。在分析什么是羣众的要求时，决不能脫离无产阶级的观点。第三，就貧农和下中农來說，其中也有先进和后进之分，在人民公社化的过程中，先进者能够敏銳地意識到什么是本阶层的最高利益，因而坚决拥护人民公社。后进者可能在开始时認識模糊，因而，显得不够坚定，但是只要經過启发教育，就可以站到坚决拥护的立場上来。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党应当依靠先进分子，發揮他們的帶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樑作用，密切联系广大羣众，推动运动的发展。但是，先进分子所以能推动运动的发展，仍然是由于公社化运动是广大农民羣众的要求。由此可見，右傾机会主义分子所謂的人民公社不是羣众要求的謬論，不过表明他們是牢牢地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場来歪曲事实，宣揚羣众运动的“自发論”，反对党对羣众运动的領導。

根据八届六中全会的決議和以后党中央的一系列指示，人民公社在整社的过程中，貫徹执行了分級管理、分級核算、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則，确定了在目前阶段实行以生产队一級的所有权为基本的三級所有制，这样就克服了人民公社初办时期由于缺乏經驗而产生的某些缺点，使得人民公社制度进一步完善，更好地發揮出来它固有的优越性。但是，右傾机会主义者却借此污蔑人民公社“搞早了”，人民公社是“有名无实”，和过去的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差不多。其实，它們对于人民公社的实际可以說是一窍不通。

八中全会尖銳地批判了这种錯誤的观点。深刻地分析了人民公社和高級农业社的联系和区别。

現阶段人民公社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質的，这同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是相同的。但是，人民公社在原来的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內容，因而它們之間有很大的区

別。高級社比較起來是小集體，人民公社是大得多的集體；高級社只經營農業，人民公社是多種經濟事業的綜合經營者；高級社只是經濟組織，人民公社是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統一組織；高級社只是集體生產的組織者，人民公社同時又是集體生活的組織者。“尤其重要的是，人民公社的所有制現在雖然還是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人民公社的所有制現在雖然還是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生產隊（相當於原來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集體所有制是基本的，公社的所有制是部分的；但是，這部分的公社所有制是原來農業生產合作社所沒有的，它包含着某種程度的全民所有制成分。由於公社可以逐年從生產隊中提取一部分積累用於辦企業，由於社辦企業的發展，並且由於國家對公社的援助，公社所有制部分必將逐步擴大，以至轉變為公社所有制是基本的，而生產隊的所有制只是部分的。目前的公社所有制雖然還是部分的，但正是這個部分公社所有制代表着人民公社的偉大希望和偉大前途。只要公社的部分所有制轉變為公社的基本所有制，那就為我國農村中的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向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過渡，奠定了可靠的基礎。人民公社在分配制度方面，現在基本上實行按勞分配的工資制度，同時也實行部分帶有按需分配的萌芽性質的供給制度，這也是原來農業生產合作社所沒有的。”（劉少奇：“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勝利”）

確定人民公社在現階段實行生產資料的三級所有制，是黨對生產關係適合生產力性質規律的創造性運用。人民公社是在高級農業社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目前的生產大隊大体相當於原來的高級社。由於公社剛成立，生產隊與生產隊之間的經濟條件還不相同，生產發展水平和收入水平有高有低，在這樣的條件下，如果不實行以隊為基礎的三級核算制，而實行公社的一級所有制，由公社統一核算，統一分配，就會產生平均主義的傾向，不利於公社內部的團結和生產的發展。但是，這種三級所有制本身就具有過渡性質，是極其靈活的。通過所有制的這種形式，我們可以適應於生產力的每一步發展，及時地調整生產關係，調整公社、生產隊和生產小隊三級所有制之間的比例，以促進生產的新高潮。當公社一級所有的經濟事業有了很大的發展而占優勢時，當窮隊在國家和公社的大力支援下趕上富隊時，就可以逐步實行公社一級所有制。由於公社一級所有制中已經包含有一定程度的全民所有制成分，因此，隨着公社所有制成分的增加，公社中的全民所有制成分也將不斷增長。從這個意義來說，這也是從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逐步過渡的運動。

人民公社現行的工資制和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其基本性質是社會主義的，是“各盡所能、按勞分配”，但其中供給制部分帶有按需分配的萌芽性質。就現階段來說，有政治掛帥為前提按勞分配是可以從物質利益刺激人們的勞動熱情，有利於生產的發展和產品豐富的，所以在社員的收入中，按勞分配的工資部分在相當長時期內必須占有重要地位，在一段時間內並將占有主要地位。隨着生產的發展，在一個時期內工資部分的比重還會有所增長。就目前說供給部分還不能太多。但是，現行的分配制度已指明了由按勞分配過渡到按需分配的途徑。因為它本身也是具有過渡性質的，是極其靈活的。隨着生產的更進一步發展，在適當的條件下，就可以調整工資部分和供給部分的比例關係，在分配關係中添加共產主義的因素。這樣也就為將來逐步向共產主義過渡準備了條件。

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也就是說，它既是經濟組織，又是政權組織。由於它是國家的基層政權組織，就可以代表國家執行政策，統一領導公社的生產建設；由於它又是經濟組織，自己掌握了經濟，就有強大的經濟力量來保證國家政策更好的貫徹執行。因此，人民公社作

为政社合一的組織，更有力地加强了无产階級专政的作用，更有利于在人民内部发揚民主。并且可以更好地促进生产的发展。不仅如此；人民公社作为政社合一的組織，还有更为深远的意义：即指明了将来政权逐渐消亡的形式，为将来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了条件。

由此可見，“人民公社不但是加速社会主义建設的强有力的武器，而且也是将来的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的社会組織形式。人民公社这样一个新的社会組織形式既然能够充分發揮高級社原有的优越性，又可以克服高級社的某种局限性，并且包含着远大理想的萌芽，那末，有什么理由不組織人民公社来代替高級社呢？难道‘錦上添花’不是更好嗎？”（人民日報社論，“人民公社万岁”）有什么理由說人民公社和高級社差不多，搞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多此一舉呢？右傾机会主义者散布人民公社“有名无实”或“名存实亡”等謬論，絲毫也不能掩盖人民公社的光輝，只是暴露了他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来面目而已。

党和毛澤东同志，根据不断革命論和革命发展阶段論統一的原則，根据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關係相互作用的辯証法，結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創造性地闡明了人民公社化的理論，解决了我国实现两个过渡：即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問題，指明了我国从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徑，这是对于馬克思主义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发展，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輝煌貢獻。这个理論已經由我国五亿多农民的實踐証明它的完全正确，今后还必然为客观事物的新的发展不断地証明它的完全正确。政治經濟学的教学中必須充分闡明人民公社化的理論。

四、关于社会主义建設中的羣众运动問題

毛澤东同志历来教导我們，在一切工作中都要走羣众路綫。不但在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中，而且在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中，都必須走羣众路綫，通过羣众运动来实现革命和建設的一切任务。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設的事业中，有系統地运用了羣众路綫的工作方法，从而形成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展开了国民經济大跃进的局面，这是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羣众路綫的工作方法的新发展。在我們党内有些不坚定分子之所以陷入右傾机会主义的泥坑，其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們不承認人民羣众在建設事业中的主动积极作用。八中全会尖銳地批判了反对在建設事业中采取羣众运动的方法，甚至污蔑这样做是一种“小資产階級狂热性运动”的荒謬观点。在政治經濟学的教学中，必須闡明关于社会主义建設中的羣众运动問題。

前面說过，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本質，是对人民羣众的在建設社会主义事业中的觉悟性、积极性、創造性的高度重視。总路綫要求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这就是号召六亿五千万人提高自己的觉悟性、积极性、創造性，把自己的热情、智慧和力量在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中充分地動員起来。實踐已經非常清楚地表明，离开羣众路綫的工作方法，就不可能达到多快好省地高速度地建設社会主义的目的。这是因为劳动者是社会生产力中的决定性因素，人民羣众是历史的創造者，解放社会生产力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都必須依靠羣众自己的力量，通过羣众运动来实现。我国有极为广大的人力，这是高速度建設社会主义的最宝贵的“資本”。解放了的中国劳动人民，不再是为剝削階級劳动，而是为自己和自己的社会劳动，因此具有迅速改变我国貧穷和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必然要打破一切常規，要求按照革命的速度来建設社会主义的新生活。这一股力量是不可抗拒的。但是，

为了充分發揮劳动人民在建設事业中的創造力量，还必須用适当的方法去調动它。党根据經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客觀規律所制定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正是我国人民要求迅速改变貧穷和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的反映，因而能調动一切积极因素溶合成一股不可阻擋的建設社会主义的洪流。总路綫就是党的建設社会主义的羣众路綫，而在全国範圍內执行“两条腿走路”方針，和在每个企业內开展羣众运动，就是在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中运用羣众路綫的工作方法的两个方面。

右傾机会主义者在这个問題上却提出与党根本不同的看法，他們認為“革命可以搞羣众运动，建設不能搞羣众运动。”他們之中，或者強調在經濟建設中組織羣众运动，就会造成生产秩序的混亂，即使一时能够跃进，也必然是引起国民經济比例關係的失調。不可能持續跃进；或者断定，在建設事业中，采取羣众运动的方法，“只能多快，不能好省；”或者宣揚农业可以搞羣众运动，工业不能搞羣众运动，因为現代工业极其复杂，只能建立一套“正常秩序”。可是，所有这些“論据”，都見不得事实，見不得真理。

“羣众运动会破坏生产秩序”嗎？是的“羣众运动发展起来以后，是会要破坏一些原有的生产秩序的。但是，它所破坏的是不利于生产发展的旧秩序，而在同时又建立了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新秩序”。（刘少奇：“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毛澤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中指出：“社会主义生产關係已經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關係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这种不相适应的部分，在一定時間內，就会成为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障碍，影响羣众的积极性和創造性的充分發揮。因此，必須在建設事业中大搞羣众运动，不断調整生产關係的各个方面，不断革新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才能适应生产力繼續向前发展的要求。實踐証明，在1958年，我們通过羣众运动，在企业中調整了人与人之間的關係，实行“两参一改三結合”，結果就大大地提高了企业的管理水平和生产水平。依靠羣众不断地改变旧秩序，建立新秩序，促进生产的发展，这正是充分發揮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右傾机会主义分子不懂得生产力与生产關係之間，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間的万古常新的辯証關係，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因此当劳动羣众破坏旧秩序时就惊惶失措，謂之“生产秩序混亂了”。这只能說明他們厌恶新事物。

在建設事业中大搞羣众运动，“只能多快、不能好省”嗎？“会引起比例失調、不能持續跃进”嗎？不。事物作了响亮的回答。在1958年和1959年这两年内，我們正是由于大搞羣众运动，實現了連續的全面的大跃进，各个部門都全面地超額完成了生产計劃，不仅多快，而且好省，并且为今后的更大更好更全面的持續跃进准备了更好的物質条件，积累了丰富的經驗。今后只要我們坚决地貫徹执行总路綫和它的几个同时并举的方針，坚持大搞羣众运动，我們的工农生产就能够不断地全面地持續跃进。

“农业可以搞羣众运动，工业不能搞羣众运动”嗎？不。工业和农业尽管在生产过程上有所不同，但是都是必須依靠人民羣众的劳动才能进行的物質生产部門。無論是工业或农业，都要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都必須大搞羣众运动。右傾机会主义者的所謂現代工业极其复杂，只能建立一套万古不变的“正常秩序”等等，其实質，不但是要用一套所謂“正規化”的方法，来束縛羣众的手脚，而且是要用它来对抗党在社会主义建設中的羣众

路線，企图把工业生产引向脱离党的领导、脱离政治、脱离群众的错误道路。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事业，大搞群众运动，就能最广泛地动员人民群众，最充分地发挥人民群众的革命干劲。在党的领导下，“广大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在旧中国的废墟上建设着社会主义的大厦，社会主义建设群众运动的高潮在全国汹涌澎湃，一浪高过一浪。它孕育出千千万万的英雄儿女，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奇蹟。事实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关于“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我们伟大的党所领导的群众运动，是我们的国家永远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力量的源泉。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群众运动中，由于经验不足，不可避免地要遇到一些困难，产生一些缺点。但是，缺点和成绩比较起来，不过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而且，必须看到，我们广大的人民群众，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密切指导下，已经迅速地解决了或者正在迅速地解决某些暂时性的、局部性的问题。也必须看到，通过两年来的群众运动，我们已经取得了一整套在企业中大搞群众生产运动的宝贵经验，诸如：领导人员和广大群众相结合，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相结合，合理的规章制度和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相结合，对群众的政治思想教育和物质鼓励相结合，等等。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在已经取得的丰富经验的基础上，继续组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就会经常地持久地保持全面跃进的局面，这是肯定无疑的。

五、关于政治经济学中几个基本关系的原理

右倾机会主义者在攻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攻击大跃进，攻击人民公社的同时，把自己装扮成精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样子，叫嚷什么这也不符合政治经济学的原理，那也不符合政治经济学的规律，其实，他们不过是恶意地歪曲和篡改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些基本原理，来掩饰他们的罪恶勾当。他们自己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来是一窍不通。我们要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中贯彻八届八中全会的精神，反击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潮，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前进，还必须正确地阐明政治经济学中关于几个基本关系的原理。

（一）生产过程中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的关系

在人与物的关系上，右倾机会主义者叫嚷什么你们太强调人的作用了，太不重视物质条件了。其实，他们是要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做物质条件的奴隶。与右倾机会主义者相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求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做物质条件的主人。

大家知道，生活中的人的因素是劳动者，这是生产中活的劳动的源泉；生产中物的因素是生产资料，即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这是生产的客观条件。这两方面的因素合起来，生产才成为可能。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全面地看待两种因素的辩证关系的。一方面，对于人们的生产来说，客观物质条件是重要的。人不可能脱离客观的物质条件而独立存在。没有必要的生产资料，人们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过程中就无所凭藉，人体内蕴藏的物质力和精神力就不会成为现实的力量。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物的因素制约和决定人的因素。但在另一方面，一切物质条件，只有被人用来进行生产时才成为真正的生产资料。没有人的作用，生产资料只

是一些死的东西。有了人的掌握运用，生产資料才能有“生命”，才能发展变化。这也就是说，人的因素对于客觀物質条件的变化，起着决定作用。因此，在承認物的因素制約和决定人的因素的同时，还必须承認人对于变化客觀物質条件的偉大能动作用。

从人类社会生产发展过程來說，这两方面互相制約和决定的因素，究竟那一方面起主导作用呢？是人的因素起着主导作用。因为，从人和物的相互作用的结果来看，是物为人用，不是人为物用，是人創造物，不是物創造人。所以，从根本上說，人是具有决定作用的因素。正如毛澤东同志指出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澤东选集，第三卷，第1053頁。）

人的主觀能动作用，在社会主义社会，具有与以往任何社会都不相同的嶄新意义。因为，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人民才真正成为社会生产的主人，劳动人民的觉悟性、积极性、創造性才有可能發揮出来。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人民的主觀能动作用，成为空前巨大的創造力量。要不要發揮这个偉大的創造力量，是馬克思主义政治經濟学与右傾机会主义的冒牌“理論”的一条根本分界綫，也是拥护总路綫和反对总路綫的一条根本分界綫。

党和毛澤东同志充分重視，并且积极地調动了这个偉大力量。前面曾經一再說明：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本質，就是对人民羣众在建設社会主义事业中的觉悟性、积极性、創造性的高度的重視。在总路綫的鼓舞下，我国人民發揮了冲天的干劲，不但在使用先进生产工具較多的工业战綫上，而且在农业、水利、交通及其他技术比較落后的生产战綫上，使用着手工工具和还不太多的机械化工具，迫使高山低头，河水讓路，大地改裝，风云变色，創造了亘古未有的奇跡。这种事实，雄辯地說明了：人，被共产主义思想鼓舞和組織起来的人，他們的主觀能动性，是多么宏偉的力量！右傾机会主义者无視这种宏偉的力量，就不能不在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高度重視人的因素、人的能动作用，毫不意味忽視物的因素，不考虑客觀物質条件。馬克思主义經濟學所強調的人的能动作用，是在一定客觀条件下的能动作用，不是沒有客觀根据的东西。但是，这与右傾机会主义者的冒牌“理論”毫无共同之点。毛澤东同志早就指出：“当然，任何人不可无根据地胡思亂想，不可以超越客觀情况所許可的条件去計劃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現在的問題，还是右傾保守思想在許多方面作怪，使許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觀情况的发展。現在的問題是經過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認為做不到”。（“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右傾机会主义者比毛澤东同志曾經指責过的右傾保守思想走得更远，他們不但認為經過努力本来可以做得到的事情是做不到的，而且把全国人民發揮冲天干劲已經做出来的偉大成績說成是“漆暗一团”。这就充分暴露出，在馬克思主义的伪装下，他們死死抱住的不过是“見物不見人”的資产階級观点而已。

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就是充分估計客觀可能性，又是高度發揮主觀能动性。总路綫把客觀的可能性与主觀的能动性巧妙地、科学地統一起来，它是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时代运用和发展馬克思主义政治經濟学的最高典范。政治經濟学的教学中必須認真貫徹总路綫的这个基本思想，并且根据这个思想正确地闡明生产过程中人与物的關係，才能保有馬克思主义政治經濟學所应有党性和科学性。

（二）生产力与生产關係的關係

与生产过程中人与物的关系直接相联系的，是社会生产的两个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右倾机会主义者又叫嚷什么你们违反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了。其实，如前面指出的，他们不过是把老牌修正主义者的“生产力论”重新搬弄一番。与右倾机会主义者相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正确地看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坚决反对“生产力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力是决定生产关系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这是一个方面。在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毛泽东同志指出：“当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矛盾论”）而且，变更了的“新生产关系是这样一种主要的和有决定性的力量，它真正决定生产力进一步的而且是强大的发展”。（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又有了新的内容。

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人民是摆脱了剥削的劳动人民，正是因为如此，同样一件机器，同样一把铁犁，在他们手中能发挥出前所未有的力量。我国的情况表明，被解放了的六亿五千万人民是生产力中最伟大的力量。他们掌握着各种生产工具形成了崭新的生产力。这种新的生产力要求生产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但是，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巨大推进作用，也是历史上任何一种生产关系所不可能具有的。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代替了私有制，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互助合作关系代替了剥削阶级统治关系，因此，就不但能使劳动者充分发挥出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且能够用统一的计划组织生产，使人尽其能，物尽其用，地尽其利，从而促使社会生产力以更无前例的高速度发展。而且，由于剥削的消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不再存在对抗性矛盾，社会主义社会就有可能适应生产力的每一步发展，自觉地、及时地、有计划地调整和改善生产关系。这正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生作用的特点。我国五亿农民在党的领导下掀起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充分自觉地掌握了这个特点来运用这一规律的杰出典范。

右倾机会主义者叫嚷什么大跃进、人民公社化都不符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客观规律的要求，恰好是证明他们根本不懂得这个规律，尤其是根本不懂得这个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生作用的特点。在他们看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根本不存在辩证统一的关系，只存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不存在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尤其不存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而他们所说的生产力，又只不过是技术、工具。生产力中最基本的因素——人，被看成是不起作用。于是，他们就得出了一个与老牌“生产力论”一模一样的“技术、工具决定论”，并且妄图以这个脆弱的螳臂来阻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跃进巨轮。毫无疑问，他们注定要遭到可耻的失败，而且现在已经失败了。

（三）政治和经济、政治挂帅和经济规律的关系

在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上，右倾机会主义者说：你们太强调政治了，太不重视经济了。右倾机会主义者这样提出问题，充分暴露了他们根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一定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的总和是基础，政治是在这个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因此，归根到底，经济是决定政治的。但另一方面，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因此，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列宁曾经指出：“不肯定这一点，就

是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最起碼的常識”。

從人類經濟發展的历史看，社會經濟變革總是經過政治鬥爭的。這就意味着，當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發生衝突時，當經濟變革的任務已經成熟時，政治鬥爭就起着決定一切的作用。無疑的，這種政治鬥爭本身又正是由經濟因素：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衝突來說明，並且是這種經濟衝突的集中表現。

在社會主義社會，政治的巨大作用尤其是以往社會所不可比擬的。因為，第一，社會主義經濟不可能在舊社會內部自發地形成，它只能由無產階級（通過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根據客觀經濟規律，領導全體勞動人民自覺地創立起來；第二，社會主義革命是人類历史上最深刻、最廣泛的革命，它必須徹底變革過去存留下來的一切階級剝削制度和必然產生剝削的一切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度，它必須徹底變革過去存留下來地建立在剝削制度和私有制度上的一切社會的、政治的和思想的上層建築。沒有共產黨的領導，沒有強有力的無產階級專政，這個革命就不可能進行徹底；第三，社會主義公有制把國民經濟連結成為一個有機整體，要調動一切積極力量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促使整個國民經濟高速度和按比例地發展，向共產主義過渡，如果沒有黨的領導，沒有社會主義國家的計劃領導，也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

黨和毛澤東同志卓越地闡發了社會主義社會中政治對於經濟的巨大作用。毛澤東同志強調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綫。在社會經濟制度發生根本變革的時期，尤其是這樣”。（“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按語，上冊，第123頁。）他還強調指出：“沒有正確的政治觀點，就等於沒有靈魂”。（“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第23頁）劉少奇同志在代表中共中央向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所作的工作報告中，也明確指出：“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永遠是一切工作的靈魂和統帥”。（八大第二次會議工作報告，第37頁）。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切工作中必須無產階級政治掛帥，必須有黨的絕對領導，這是黨和毛澤東同志對於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造性的發展。

右傾機會主義者反對強調政治，而且硬把政治掛帥的原理同經濟歸根到底決定政治的原理對立起來，大事宣揚馬克思主義早已嚴厲駁斥過的“經濟片面決定論”，這個事實，不但說明他們對馬克思主義是一竊不通，同時也充分說明了“政治掛帥”的原理的正確。因為右傾機會主義者反對強調政治，實質上就是反對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綫，他們並不是不要政治掛帥，只不過是要以他們的資產階級政治掛帥，來代替黨的無產階級政治掛帥。由此可見，在過渡時期，兩條道路的鬥爭始終是存在的，黨的政治掛帥的原理是決不容許動搖的。

右傾機會主義者還說：“政治掛帥不能代替客觀經濟規律”；他們企圖向人們證明：提倡政治掛帥就是違反客觀經濟規律。這同樣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惡意歪曲。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經濟規律是客觀存在的，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但是，客觀經濟規律是可以認識的，因而是可以被人們掌握和運用的。實際上，只有真正樹立了無產階級世界觀，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來看問題，才能夠真正發現和認識客觀經濟規律。這也就是說，政治掛帥對於認識、掌握和運用客觀經濟規律具有決定作用。右傾機會主義者把政治掛帥和客觀經濟規律對立起來，實際上是否定了人們認識、掌握和運用客觀經濟規律的根本前提。

其實，右傾機會主義者談論“客觀經濟規律”，不過是要以他們主觀所崇拜的“少慢差

費”來和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相對抗，並且妄圖誘使中國人民脫離黨所領導的社會主義道路。1958年和1959年的連續大躍進，無可辯駁地証實了黨的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是完全符合客觀經濟規律的。有了這條總路線，我國能夠保持不斷躍進，是確定無疑的了。右傾機會主義者不改變他們的立場，就永遠只能抱着他們想象的“客觀經濟規律”向隅而泣而已！

(四)黨的領導和羣眾運動的關係

堅持黨的領導和大搞羣眾運動，是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徹底勝利的根本保證，這兩個方面是有機地聯系而不可分的。右傾機會主義者的一切反動論點，最終無一不是攻擊黨的領導和羣眾運動。

右傾機會主義者把在黨的總路線的鼓舞下掀起的轟轟烈烈的羣眾運動、污蔑為“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同時，為了粉飾其反動的論據，他們抓住羣眾運動中的個別缺點，加以誇大，說這個“搞亂了”，那個“搞糟了”，散布資產階級的悲觀情緒，企圖把羣眾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積極性壓抑下去。右傾機會主義者是害怕羣眾運動，並且堅決反對黨的羣眾路線的。

與右傾機會主義者完全相反，黨和毛澤東同志一貫堅持羣眾路線是我們黨在一切工作中的一條根本路線。要不要羣眾路線，要不要大搞羣眾運動，是無產階級革命家和資產階級革命家的根本分界線之一，它關係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些基本原理。首先，如果我們承認歷史是人民羣眾創造的這樣一條基本原理，那就沒有理由不在一切鬥爭中貫徹羣眾路線，就沒有理由不去充分發動羣眾。其次，如果我們相信“工人階級的解放應該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事情”，勞動人民的解放應該是勞動人民自己的事情這樣一條基本原理，同樣地就沒有理由不在一切鬥爭中貫徹羣眾路線，就沒有理由不去充分發動羣眾。最後，如果我們承認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就在於它堅信並且緊緊依靠人民羣眾的力量，它的實質就在於“從羣眾中來，到羣眾中去”，那也就沒有理由不在任何革命階段堅持羣眾路線。毛澤東同志是極其深刻地掌握了這些原理的精神實質的。毛澤東同志對於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最傑出的貢獻之一，就是他第一次明確地論證了：不但在社會主義革命中，而且在社會主義建設中，都必須大搞羣眾運動。正是由於毛澤東同志在理論上概括了社會主義建設中大搞羣眾運動的可能和必要，並且貫徹在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中，就使得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出現了空前未有的全面的持續躍進的局面。完全可以說，有了轟轟烈烈的羣眾運動，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就能一個高潮接着一個高潮地向前發展，各種建設工作就能夠多快好省地進行。反之，如果沒有這種羣眾運動，革命和建設，就只能是在少數人冷冷清清的情況下進行，就只能少慢差費。完全可以說，毛澤東同志這一個創造性的發展，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新條件下增添了嶄新的內容。

如果說沒有革命的羣眾運動，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就不可能成功，那麼，還必須進一步說，如果沒有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也就沒有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羣眾運動。因為，沒有黨的領導，羣眾運動就會迷失方向。只有在黨的絕對領導下，才能保證羣眾運動，朝着社會主義方向迅速前進，才能保證六億五千萬人民的最大利益得以實現。也正是因为這樣，右傾機會主義者要極力攻擊黨的領導。

右傾機會主義者除了以資產階級老爺式的態度來對待我國的革命羣眾運動以外，他們中

也有人积极地宣揚羣众的自发运动，力图削弱和反对党对羣众运动的領導。右傾机会主义者所崇拜的“自发論”，也不是什么新东西。馬克思主义者早就駁斥过这种反动論点，指出，工人階級的自发运动，只能产生工联主义，不可能产生出科学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只有掌握着科学社会主义的馬克思主义政党才会把工人階級的革命运动引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工联主义實質上是散布资产階級的影响。右傾机会主义者在中国工人階級已經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決定性胜利后，还大力宣揚自发論，反对党的領導，只不过充分暴露出他們的用心是为复辟資本主义扫清道路而已。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階級和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了与人民羣众血肉不可分割的联系，領導全国人民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社会主义的偉大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光輝成就，因而在中国人民中享有最高的威信。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經驗，集中在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的思想中。毛澤东思想为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武庫中增添了新的最銳利的武器。广大人民羣众完全信賴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英明正确的領導，是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并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可靠保證。右傾机会主义者企图削弱和反对党的領導，真是痴人說梦！

(五)不断革命論和革命发展阶段論的關係

把不断革命論和革命发展阶段論統一起来，运用于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是党和毛澤东同志对馬克思主义政治經濟学的又一个最傑出的貢獻。誰要是不懂得这一条基本原理，誰就不可能真正認識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質，从而也就不可能真正十分明确地解决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問題。

整个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的低級阶段，也就是从資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它虽然是一个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經阶段，但决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阶段。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互相联系，并且是共产主义的必要准备，它本質上是共产主义的；但社会主义又是从旧社会剛剛脫胎出来，它还不成熟，还帶有旧社会的残余和癥痕。社会主义的向前发展过程，就是共产主义不断成长和資本主义的残余和癥痕不断消除的矛盾斗争过程。如果我們沒有不断革命論的观点，就不可能从这个矛盾斗争的发展过程来把握社会主义，就不可能理解党的路綫、方針、政策促使社会主义迅速向共产主义发展的重大的和深远的意义，也就不能从矛盾斗争的发展中来闡明社会主义的各种經濟形式和各种經濟范疇。其結果，在理論上，就必然会陷入庸俗的进化論，把社会主义看成是只有量变沒有質变，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間隔上一座万里长城，甚至于把社会主义說成是无矛盾无斗争的僵死的东西。在實踐上，就必然会怀疑多快好省，贊成“少慢差費”，甚至于陷入与党对立的右傾机会主义者的泥坑。

由此可見，在政治經濟学的教学中，占有首要地位的是：必須始終貫徹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論。不然，政治經濟学的教学就会失去它所应有的党性和科学性。

但是，坚持不断革命論，并不排斥革命发展阶段論。馬克思主义政治經濟学認為不断革命論和革命发展阶段論是可以統一的，而且是應該統一的。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发展阶段反映事物的質的变化，不应当把这些不同質的阶段互相混淆起来”。（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決議）因此，应当認真地区別社会主义的原則和共产主义的原則，反对不考虑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主观地要求超越

必經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然而，区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为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一个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不断革命过程，二者之間不存在任何对立，事实上，只有把二者統一起来，真正認識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两个互相联系而又互相区别的发展过程，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必要准备，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发展阶段內也会发生較小的質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領会党和毛澤东同志所指示的：我們决不能在社会主义阶段上停步不前，但是也不能陷入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跳入共产主义阶段的空想。

在对待整个社会主义阶段以及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問題上，如果把不断革命論和革命发展阶段論对立起来，只承認不断革命論，不承認革命发展阶段論，就会陷入“左”傾机会主义的盲目空想的錯誤；另一方面，如果只承認革命发展阶段論，不承認不断革命論，就会陷入右傾机会主义的錯誤。右傾机会主义是我国当前的主要危險。右傾机会主义者企图阻碍我們的事業前进，阻碍我們的持續跃进，阻碍党的总路綫的貫徹执行。因此，政治經濟学的教学中貫徹不断革命論与革命发展阶段論統一的原理，必須首先与右傾机会主义进行斗争，扫除它的影响，才能更好地完成宣傳和保卫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任务。

1959.12.于珞珈山